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邵敬敏 著
方经民

ZHONGGUO LILUN YUYAN XUE SH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邵敬敏 方经民 著

(沪)新登字第201号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邵敬敏 方经民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55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阜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300千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本

ISBN7-5617-0801-7/H·062 定价: 平6.70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古代语言研究中的理论探索(先秦——1912)	
.....	(12)
第一节 概述.....	(12)
第二节 先秦两汉的语言理论探索.....	(14)
第三节 魏晋唐宋的语言理论探索.....	(19)
第四节 元明清的语言理论探索.....	(22)
第二章 初创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12—1949).....	(28)
第一节 概述.....	(28)
第二节 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建立.....	(32)
第三节 语法理论的研究.....	(39)
第四节 汉语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	(51)
第三章 探索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49——1976)	
(上).....	(61)
第一节 概述.....	(61)
第二节 国外理论语言学的译介和评论.....	(65)
第三节 理论语言学的教学和教材.....	(70)
第四节 理论语言学著作和基本理论探讨.....	(76)
第四章 探索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49——1976)	
(下).....	(90)
第一节 语音和音韵理论研究.....	(90)
第二节 词汇理论研究.....	(101)
第三节 语法理论研究.....	(107)

第四节	修辞理论研究·····	(121)
第五节	方言理论研究·····	(126)
第六节	民族语言理论研究·····	(134)
第五章	发展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76——)	
(上)·····		(144)
第一节	概述·····	(144)
第二节	国外理论语言学的译介和评论·····	(149)
第三节	理论语言学的教学和教材·····	(160)
第四节	理论语言学著作和基本理论探讨·····	(172)
第五节	中国语言学评论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	(186)
第六章	发展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76——)	
(中)·····		(203)
第一节	语音和音韵理论研究·····	(203)
第二节	词汇、语义理论研究·····	(210)
第三节	语法理论研究·····	(222)
第四节	修辞理论研究·····	(240)
第五节	方言理论研究·····	(255)
第六节	民族语言理论研究·····	(262)
第七章	发展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76——)	
(下)·····		(275)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研究·····	(275)
第二节	文化语言学研究·····	(289)
第三节	话语语言学研究·····	(296)
第四节	心理语言学研究·····	(305)
第五节	计算语言学研究·····	(312)
第六节	模糊语言学研究·····	(323)
第七节	应用语言学研究·····	(329)
第八节	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	(342)

第九节 对比语言学研究·····	(354)
第十节 类型语言学研究·····	(363)
结语·····	(371)
附录：港台及国外汉语语言学理论研究·····	(377)
后记·····	(388)

绪 论

一、对于理论语言学的两种不同理解

语言学研究可以分为三组两两相对的分支学科：(一)普通语言学与个别语言学；(二)微观语言学与宏观语言学；(三)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①这三对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划分是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标准获得的，因此在内涵上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

普通语言学和个别语言学的对立在于研究的对象：如果研究对象是人类一般语言，即人类所有语言的共同规律，那么它就是前者；如果研究对象是某种特定语言具体的个性规律，那么它就是后者。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的区别在于研究的范围：如果研究范围只限于语言本身，那么它就属于前者；如果研究范围扩大到语言跟语言以外的现象之间的联系，那么它就属于后者。至于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差异则主要在于研究的目的：如果研究目的是通过概括语言各种系统的规律，或者提出各种假设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那么它就应该属于前者；如果研究目的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分类描写(描写应用)，或者解决与语言运用有关的各种实际任务(实际应用)，那么它就应该属于后者。^②

对于理论语言学，客观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狭义理解，即理论语言学基本上相当于普通语言学，这可以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与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为代表。

(二)广义理解，即理论语言学是关于人类语言研究的理论和

方法的总和,它既包括人类一般语言的共性与规律的总结,又包括个别语言的个性与规律的概括,对中国理论语言学来讲,尤其应包括汉语的特点与规律的认识。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与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这一看法。

基于以上我们对六种语言学分支学科的认识,本书对理论语言学作广义理解。具体来讲,广义的理论语言学应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

第一,探讨人类一般语言的基本理论。诸如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功能、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起源、语言的发展、语言的类型等等。

第二,建立语言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具体语言现象作出解释。这种理论框架既涉及微观语言学,也涉及宏观语言学,既涉及普通语言学,也涉及个别语言学;这种解释,既包括对语言普遍现象作假设性解释,也包括对语言特殊现象作规律性解释。

第三,总结语言研究的方法。语言研究方法有的具有普遍性,适合各种语言或各个领域的研究,甚至可能移植、借鉴到其他学科去;有的则具有特殊性,只适合于某种或某些语言,或语言学某个或某些特殊的领域的研究。对这些研究方法需要从方法论高度予以总结。

第四,探求语言学历史,评论语言学现状。语言学理论发展有三大动力:一是新发现的语言现象对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哲学理论的开拓对语言学理论赋予新的活力。因此,紧密结合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评论、总结,是理论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广义的理论语言学就是要为一般语言或者个别语言,从微观和宏观不同角度提供一套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二、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中国到底有没有理论语言学？这个问题在中国语言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这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即如何认识理论语言学的性质与内涵，如果仅仅局限于狭义的理解，那么中国的理论语言学确实相当薄弱；但如果作广义的理解，那么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语言学理论的特点。

中国是世界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之一，^③有着悠久的语言研究传统。早在先秦时代，荀子就提出著名的“约定俗成”的命题，对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令人叹服的回答。传统的小学（语文学）研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在理论及方法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理论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则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中国以后才建立起来的。1898年，马建忠参照拉丁语法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已经显露了普通语法学的思想。20世纪初，一些旅日学者在日本又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普通语言学学说，并开始了理论语言学的探讨。1906年，章炳麟（章绛）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提出“小学”要改称为“语言文字之学”，^④这表明我国学者对语言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了重大转变。胡以鲁在1912年发表《国国学草创》，^⑤这是中国第一部理论语言学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诞生。经过70多年曲折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理论语言学已初具规模，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在吸收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有所选择、有所改造、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特别注意用中国境内语言，尤其是汉语研究的丰富经验和出色的成果来丰富语言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理论价值的新观点、新方法；二是继承小学传统，将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贯穿于具体的语言事实的研究之中，因此，往往语言的事例相当丰富，具体分析也十分精细，而所用的理论与方法则需要细心揣摩，不能一目了然。在形成这些特点的同时，中国理论语言学也产生了某些不足之处，这主要是缺乏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概括、提高的自觉意识，因而导

致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脉络不够清楚，这就更需要中国的语言学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理论语言学进行必要的发掘、整理和总结，也恰恰说明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开始于 30 年代。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7)、《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9)以及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 1938)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史。何容《中国文法论》(开明书店 1942)第一次对《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作了专题史式的总结。然而，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语言学史则是从 50 年代才开始的。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先期工作，由日本“中国语学研究会”编写的《中国语学研究史》(江南书院 1957)是在日本出版的最早的一本中国语言学简史。王立达曾根据该书编译成《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 1959)一书。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 1958)第一次把中国语言学史纳入世界语言学史进行阐述；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的大部分章节在 1963 年至 1964 年的《中国语文》上连载。80 年代这一方面研究出现了高潮：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胡寄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等相继出版。然而这些著作基本上仍然是以论述中国传统语文学史为主，即使介绍一些中国现代或当代的语言学研究，也极为简单；至于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则基本上没有涉及。1985 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上，方经民、吴勇毅、陈国芳提交的长篇论文《我国的理论语言学，1949——1984》是第一篇有关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专论，但还属于断代史研究性质。⑥ 因此，对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历史进行探讨和总结是中国理论语言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是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必须具备三个特点：1. 鲜明的中国风格，即以结合中国境内

的语言,尤其是汉语所作的理论研究为主;2. 浓厚的理论色彩,即以研究语言的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为主;3. 清晰的历史线索,即以显示各个历史时期语言学理论发展的轨迹为主。按照广义理论语言学的理解,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包括一般语言的理论探讨,也包括以具体语言,尤其是汉语及其方言,以及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理论探讨。它论述的范围,从原则上讲,除了中国大陆学者有关论著之外,理应包括港台及国外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们还没有条件对国内外所有关于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进程作出全面研究,因此本书的论述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大陆学者的有关研究,待将来条件允许,再作这方面的补充、调整。本书附录“港台及国外汉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只是简单介绍,聊作弥补。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任务主要有以下五条:

(一) 探讨中国理论语言学创立、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

(二) 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中国理论语言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三) 对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上重大事件,包括重要理论问题讨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 对主要的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得失及其影响,以及重要的理论语言学论著作作出公正客观的评述。

(五) 总结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中国理论语言学发展的前景。

三、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分期问题

语言学史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年史写法,即以年代为序,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有代表性的事件、流派、学者、论著作综合性论述;一种是专题史写法,即以专题或研究领域为纲,分门别类论述有关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受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特点;同时,理论语言学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而各领域研究的发展情况又各有特点很不平衡。作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为了全面反映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历史面貌,宜采取以编年史为主、专题史为辅的写法。具体来说,就是将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划分为若干时期,每个时期再根据研究的情况和特点,分为若干专题或领域分别论述。不同时期研究专题或领域的划分注意前后呼应,保持连贯,以显示同一专题或领域研究的发展变化进程。

严格说来,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历史分期应以中国理论语言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理论与方法的重大转变突破为标准。但是,由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深受社会发展历史的影响,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会导致学术研究尤其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的转变,因此,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分期还必须充分参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中国社会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时间上往往早于中国理论语言学理论方法上的重大转变,其间须经历一个酝酿过程,我们以前者作为分期的时间,以后者作为分期的标志。

根据以上标准,我们把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分为“初创”、“探索”和“发展”三个时期。

(一) 初创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12——1949):中国理论语言学诞生在“五四”运动前后,这决不是偶然的。它以胡以鲁《国语学草创》问世为标志。中国理论语言学主要受欧美理论语言学的影响,章炳麟、刘师培、胡以鲁、陈望道、方光焘等人都是通过旅居或留学日本接触到西方理论语言学学说的;赵元任、李方桂、陆志韦、王力、吕叔湘、高名凯、岑麒祥等人则直接留学欧美,接受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这一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在介绍西方各种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语言学学科建设;语法研究结合汉语特点进行初步探讨,由草创到探索,在理论建设上取得一定的成绩;语音理论方法的探讨也有过较突出的贡献;汉语方言、少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修辞学研究也开始于这一时期。

(二) 探索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49—197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从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形成标志是1950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翻译出版。由于1966年到1976年中国处于十年动乱时期, 学术研究陷于停顿, 因此, 严格说来探索时期只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期。斯大林著作对中国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基本上接受了以阐释斯大林著作中的理论问题为主要任务的苏联模式。50、60年代对语言学基本理论的探讨比较重视, 曾集中讨论过“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词义和概念”等语言学基本理论问题, 从这些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苏联理论语言学的影响, 尤其是某些基本理论的讨论, 存在较明显的模式化、教条化倾向。即使是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 苏联的影响依然存在,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这一时期西方理论语言学遭到各式各样的批判, 但在具体研究中则自觉或不自觉有所运用。特别是在语法领域里,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通过汉语语法专题和研究方法的多次讨论, 逐步扩大了影响, 并得以发展。此外, 配合语文工作三大任务以及为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文字, 汉族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等也总结了一些理论方法。

(三) 发展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1976——): 1976年,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 学术活动逐渐恢复正常, 并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活力。中国理论语言学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 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形成标志是1978年《中国语文》等语言学刊物的陆续复刊或创刊。1979年开始的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问题的讨论表明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开始摆脱苏联的模式化影响, 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随着同国外学术交流的加强, 当代的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广泛借鉴美国、西欧和苏联60年代以来的研

研究成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理论语言学进行全面的、多元化的研究,不但在微观语言学各个领域的理论探讨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且在世界语言学潮流的推动下,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宏观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模糊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以及类型语言学等跨语言学科的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内涵。

发展时期的下限自然会延伸到 90 年代,但本书论述的史料只限于 1989 年底以前。

应该指出,在中国理论语言学诞生之前,我国古代两千多年来的语言研究中,也有不少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尽管这些探索是不全面、不系统的,但作为一部完整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史,有必要对这一酝酿时期的成绩加以整理,为此,我们把古代语言研究中的理论探索单独列为一章进行论述。

四、若干基本原则问题的讨论

在研究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涉及一些基本原则,有必要予以讨论。

1. 史料和史观。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出版的理论语言学专著很少,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各类论文里,因此对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研究来说,在肯定重要专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同时,更应该重视从大量的论文中提炼、归纳、总结出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发展线索。对史料的选择、整理和评价是在一定的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历史主义。这就意味着,对曾遭不公正批判的学者、论著、观点,恢复他们的历史面貌,给以公正的评价;对有争议的学术观点,加以如实的整理、介绍,并从历史发展角度给以评论。

2. 时代和科学。科学的发展除了取决于它对研究对象的认

识不断深化之外,还受到社会形势和学术思潮的影响。就中国理论语言学史而言,“五四”时期提倡科学与民主和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50年代学习苏联并制定语文工作三大任务以及50年代末开始的强调意识形态的极“左”思潮,70年代末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等等,分别构成了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此,我们在全面论述每个时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情况时,首先在“概述”里介绍该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该时期研究的总特点,以揭示其内在的联系。

3. 学科和学派。理论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要回答语言是什么。语言如同一个不规则的球体,由无数个面组成。语言学家对语言这个球体的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认识不同,确定的理论目标不同,就会提出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不同的学派。任何一个学派所提出的理论都只是对语言某一局部的认识,它只能代表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正是这些不同学派提出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构成了理论语言学这门学科,并推动它的发展。中国虽然缺乏公开打出自己旗号的众多的理论语言学学派,但由于研究角度和认识的不同,客观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与流派。同时,许多研究是在吸收借鉴国外不同学派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吸收借鉴上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学派的观点分歧。中国理论语言学史是一门学科的发展史,而不是某种理论、某种学派的发展史,因此,对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学派的理论探索不应有所偏废,都要从历史发展角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4. 理论和描写。理论既是对描写的总结,又是对描写的指导;描写既是对理论的应用,又是对理论的检验。理论在描写中形成并在描写中发展。中国语言学研究中的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有不少是吸收借鉴国外的,这些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在研究西方语言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中国语言学家对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加以选

择、吸收、借鉴,并运用于中国的语言尤其是汉语事实的描写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对这些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又有所修正、有所改造、有所发展,其中不乏自己的创见。这种研究本身也是对理论语言学的贡献。可惜从事具体语言事实描写研究的人大多不愿意公开讨论理论和方法,也不大愿意明确表明自己描写分析中所隐含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理论和描写本身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就其极端方面而言,其区别是分明的,但其中间层次,界线不那么清楚。往往是描写之中有理论,理论之中有描写。因此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研究不应该把眼光只盯在以理论探讨为主的论著上,还应该对一些看上去是以事实描写为主的论著进行分析、比较和提炼,对其理论贡献给予客观的评价。

5. 译介和评论。中国的理论语言学是从西方引进的,翻译介绍国外理论一直是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由于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才推动了中国理论语言学乃至对整个中国语言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要全面研究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对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应忽视。当然,翻译介绍国外的理论,其本身并不是理论研究,如果在译介国外理论的同时,溶进了作者的评论,乃至自己研究的心得,那就带有研究性质了。语言学评论是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上,专门评论国外语言学的并不多,大多是在介绍中附带加以评论,而且跟以译介为目的的文章界线不易划清。因此宜将国外理论语言学的译介和评论放在一起论述。至于中国语言学评论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则是理论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因而有必要予以充分论述。

6. 略古和详今。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三个时期,从时间长短看,初创时期最长,探索时期次之,发展时期尚未结束,而且最短;从研究成果看,则恰恰成反比例,后者最大,前者最小。为真实反映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历史面貌,我们采取略古而详今的撰写

原则,将论述的重点放在探索、发展两个时期,尤其对最近这一时期更予以充分的注意。我们认为这样写法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当前的理论语言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理论语言学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了,但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却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承认,跟世界理论语言学的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但是,我们也应当充分肯定 70 多年来,中国语言学家在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上所作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因此,我们应该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总结前人走过的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指导今后的研究,这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的研究尚属草创阶段,需要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这就需要更多的人关心、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研究的深入,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① 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Lyons)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1977)撰写的“语言学”词条中将语言学分为“共时与历时”、“理论与应用”、“微观与宏观”三对,没有“普遍与个别”的对立,但他所说的理论语言学跟一般所说的普通语言学基本一致。

② 语言描写是否应该属于应用语言学范围,语言学界有不同看法。哈利迪(M·A·K·Halliday)等认为语言描写只是对于语言学理论的使用,而不是对于语言学的应用;S·皮特·科德(S·P·Corder)则认为语言描写是语言学理论的第一阶段的应用。我们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宜对应用语言学作广义理解。

③ 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是中国、印度和希腊。有人认为阿拉伯也是古代语言研究发源地之一,但阿拉伯语言研究是在公元八世纪以后才获得发展的,并且受到希腊和印度语言研究的影响,故不宜看作一个独立的源头。

④ 参看章绦(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5册第24—25页。

⑤ 笔者现查到的《国语学草创》为民国二年一月(1913年1月)第二版,据黎锦熙在《国语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19)中讲:“民国初年,胡以鲁氏始著《国语学草创》一书”,可见初版当为1912年。

⑥ 该文删改后分成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国外理论语言学的翻译和介绍》,《外语界》1985年第2期;《建国以来理论语言学研究概述》,《语文导报》1985年第11期;《1949~1984:我国汉语研究中国外理论语言学成果的借鉴和发展》,《华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